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百年回首话五四

赵 敦 华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不是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结合的时代精神。“民主与科学”和“爱国与进步”不是两条分离的、平行的思想路线,而是同一时代精神的两个方面。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导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此后的时代精神与五四精神不同。需要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修正“民主与科学”精神中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因素。五四精神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精神仍然有所裨益。

关键词: 五四运动;时代精神;民主与科学

中图分类号: K 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3-0013-04

提起“民主与科学”这句口号,人们自然会想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建校伊始,指导思想仍然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过一二十年时间,人们发现老的思想不灵,国家的危难仍然在不断加剧,这才促使人们面向外国寻找真理,终于在以北京大学为策源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和科学”在当时虽是作为两位洋先生(“赛先生”和“德先生”)被请到中国来的,它代表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的夙求与中华民族解放振兴的历史趋势。因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风靡大江南北,开启了一代新风,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广泛传播,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造就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与北京大学有关的历史,是为了强调:“民主和科学”不是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这个词是通过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马克思在 1842 年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die geistige Quintessenz ihrer Zeit)。”[①]在此意义上,五四的时代精神不属于西学东渐的一个思潮,和清末和民国初学术思潮也属于两个时代,甚至和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不尽相同。胡适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样说是准确的。新文化运动是思想解放思潮,而五四运动则是社会政治运动,两者既有联系也不相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对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和新传入外国思潮进行理性“审判”,虽然“法官”们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但他们遵循相同的裁判规则,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术和政治。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分歧,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原封不动地照搬古语旧学没有立足之地。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一代学术宗师的涌现和民智大开的新风尚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而五四运动则是大批先进分子推动的现代政治变革的社会效应。两者相互激荡、彼此呼应,而又不相混淆。我曾把五四精神称作中国式启蒙的时代精神,基于以下历史事实和分析。[②]

五四精神的“民主和科学”和“爱国与进步”不是两条分离的、平行的思想路线,而是同一时代精神的两个方面。中共创始人和第一代核心是在

收稿日期: 2019-03-31

作者简介: 赵敦华,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所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 2 版,第 220 页。

② 赵敦华:《何谓“中国启蒙”——论近代中国的三次启蒙》,《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10 期。

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在抗战时期大多去了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有统计资料表明 80%跟随共产党,只有 20%去了国统区,其中还有一些是地下党。我认为这个结果不能只用两党争取人才的政策不同来解释,更深层次原因是顺应还是违背五四的时代精神的差别。

国民党 1927 年得到政权后开历史倒车,在思想上否定五四精神。比如,1931 年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毁弃了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再如,1934 年国民党中央通过“尊孔祀圣”决议,规定各地学校必须读经;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与伪满的复古运动遥相呼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美梦,乞灵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伪满洲国的国文教材充斥着“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忠孝一本、孝子故事、曾国藩谕子书”等内容,伪满“总理”、清朝遗老郑孝胥用“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的谬论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王道乐土”①。还如,1943 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抗战胜利后建国纲领的思想基础定位于“四维八德”。

与此针锋相对,中共坚持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方向,把从苏俄引进马克思主义与从西方引进法德启蒙思想结合起来,1931 年之后,倡导抗日救亡、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社会开明和个性自由“五位一体”的“新启蒙运动”。一些倡导者后去延安,成为中共理论家,与毛泽东等领导人集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理论纲领。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结果是,既没有人才也没有理论;违背五四时代精神的结果是,丧失了人心,失败实属必然。

前几年纪念新文化运动 100 年之际,学术界有不少负面的批评意见。有论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引入各种新学,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德先生”和“赛先生”俨然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我不敢苟同,因为不符合事实。

五四前后“新学”的滥觞是多元的,既有向西看,也有向东看,比如梁漱溟立足中国的东西方文化分别;既有科学精神,也有人文精神,例如学衡派引进美国白碧德的新文人主义而主张“融合新旧,撷精立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张君劢引进柏格森的形而上学而引起“科玄之争”。总的来说,五四时期思潮可分西化派、保守派和革命派三种类型,但三者的眼界都试图融汇中西思想或新旧学说。比如,梁漱溟认为引进西方文化之中的民主与科学这两种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保守派另外一个代表杜亚泉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论”。再如,西化派的胡适坦陈,“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他身体力行“整理国故”,和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创立新史学,根本没有“割裂”而是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还如,革命派的经典《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深入批判“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充分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②

再者,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被盲目崇拜的“菩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相反的倾向倒是值得警惕防范,现在打着“弘扬国学”旗号的愚昧和迷信,还不令人触目惊心吗?

当然,我们今天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历史诠释的层面,更不能局限于五四前后的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迈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时刻,我们应当赋予“民主与科学”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使这一光荣的历史传统仍然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我们要有新的探索,新的实践。

在肯定“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应该看到它在被引进中国之时就有先天不足的弱

① 转引自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5 年 5 月,第 17、1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3—624 页。

点。20 世纪初叶,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一是实证主义,一是功利主义。当中国人从西方引起“民主与科学”观念时,不可避免地把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功利主义的民主观带了进来。这两种思潮在后来的发展中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且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实际。受此连累,“民主与科学”的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没有普及和发展,也未能真正溶化在国民素质之中。即使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故乡,西方思想家也认识到了这种危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导致唯科学主义,产生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功利主义的民主观主张用忽视甚至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来换取“最大限度的幸福”,其后果或是流于自由放任,或是沦为极权专制。这些批判出自深奥的学理或哲学,但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其合理性与可借鉴之处。我们需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实质做些反思。

“民主与科学”不只是分别适用于科学界与政治界的两种分离的思想,也不是只适用于这两个领域的局部观念。它应是适用于全社会的时代精神,应成为全民族的思想素质的要素。提倡“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在我看来,首先需要提倡的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科教之所以能够兴国,固然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只有人才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我们理解的第一生产力,不仅仅是高科技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具有科学精神、因而能够正确掌握并不断创造科技新成果的人。同样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不能分家。缺乏民主的精神氛围以及民主制度所能保障的思想和学术自由,科学难以发展,甚至会被窒息。同样,没有科学的开放精神、理性标准、求实态度和创新作风,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观念与制度。只有达到了民主与科学相统一的精神,才不致把“科学”与“民主”分别局限在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职业范围之内,而让“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成果惠及人民。

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也曾想把民主与科学推广到全社会,但是,他们只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达到某个预先确定的目标的手段。按实证主义科学观,科学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这就是经验证实的方法。按功利主义的民主观,民主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成员幸福的手段,其唯一途径就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就是以全民选举为合法性基础的代议制。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有共通之处:他们一方面以预定的目标来限定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功能归结为一些狭隘的手段和方法,这不符合“民主与科学”的批判创新思维方式和自由开放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把民主与科学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机制,渗透于这一机制的精神,从肯定方面说,就是实事求是,即按照事实的变化,不断地设置、调整和修订自身的目的和手段;从否定方面说,这也是自我批判的精神,即不断地主动地清除自身的错误、落后和腐朽的成分。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与科学都是一种参与和对话的动态机制,科学的活力在于信息的交流与竞争,社会的活动在于权力的分化、配置与制衡。

北京大学作为“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的摇篮,更有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一个首要的任务是按照“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培养跨世纪的新人。现在,素质教育已成为北京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北京大学的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除有丰富的中外文化资源之外,更有“民主与科学”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地开发利用。北京大学素有学术自由的氛围和风气,我们应该珍惜它、爱护它,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它。只有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才会有创新的源头活水,才能弥补北京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师稀少、没有学派的缺憾,才能让北京大学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北京大学在很多青年人的心目中是一片精神上的净土。这是“民主与科学”传统给北京大学带来的荣誉,也要靠“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来维护。现在,腐败风气无孔不入,学术界、教育界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要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学术界、教育界的腐败是严重、危险的腐败。试想:如果未来一代是在腐败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如果连高尚的学术和师生

道德也要屈从于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前途,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为了抵御和清除学术界、教育界的不正之风、腐败之风,我们依然要借助“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因循科学的态度和措施、民主和作风的管理,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教育的纯洁。

A Centennial Review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Zhao Du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ought and reality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s an epochal spiri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founding program of New Democratism in the 1940s. After that, the epochal spirit becam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utilitarianist and positivist factors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make it beneficial to our present epochal spirit.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epochal spirit, democracy and science

(责任编辑　　管　琴)